

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中国特色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开拓*

顾海良

内容提要: 开拓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特色和学理依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经济思想围绕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 and 经济关系发展这一根本的、核心的问题,开创了以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形成史”为对象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样态,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理论以及“系统化”结构问题作出系列的创新性探索;以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对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和怎样发展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问题作出创新性探索;在集中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也对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作出创新性探索。

关键词: 习近平经济思想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

开拓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特色和学理依循,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学术要义和学理标格。这里提到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1月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学习内容的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提出的概念。它的核心要义在于: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着力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在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过程中,“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①

一、习近平经济思想与“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对象特征和学理依循

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同时,也对改革开放一直到2015年间,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最初形态作出概述。这一概述中的“重要理论成果”主要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四化同步”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农民承包的土地具有“三权”属性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改革开放前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和认识,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②习近平的这一评价表明,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根源于当代中国国情,其对象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实际,在理论上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为指导,又凸显

* 顾海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邮政编码:100871,电子信箱:18910156251@163.com。

①② 习近平,2020《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第16期。

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的新话”的特色。

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对象,是对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现代史”和“形成史”对象特征的深刻把握和学理创新。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马克思在对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现代史”和“形成史”特征探索时认为:资本“生成”和“产生”的“条件和前提”,显然“属于资本的历史前提,这些前提作为这样的历史前提已经成为过去,因而属于资本的形成史,但决不属于资本的现代史,也就是说,不属于受资本统治的生产方式的实际体系”。^①在马克思看来,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及《资本论》的对象特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史”而不是其“形成史”。以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在新时期和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都是以中国现实的经济关系变革和发展的“形成史”为主导线索的,都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的“形成史”为对象特征的。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②的过渡性特征,凸显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具有的“形成史”的对象特征,这也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显著理论特色和重要学理特征。

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到,“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③毛泽东这里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或者说“不发达的社会主义”^④的政治经济学发展问题,在根本上就是怎样看待《资本论》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代史”为对象特征和中国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要以“形成史”为对象特征的问题。毛泽东提出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受到一定限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的问题意识,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在对象特征探索中凸显的问题导向。

2013年11月,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以“形成史”为主导线索,从党的十四大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过程和实践发展的探索中,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作出创新性探索。习近平指出“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二十多年间,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可以看出,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⑤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体制融入制度生成过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性和制度性的融合、结合过程的“形成史”探索中,习近平得出了全面深化改革要“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的论断。^⑥党的十四大概括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核心问题,转化为新时代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核心问题,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创新性理论。

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以“形成史”为对象特征,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1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02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⑤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63—164页。

⑥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64页。

学说演进和学理主旨的科学概括。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刚建立,毛泽东在这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中就提出“从发展的观点看”^①经济建设的思想,提出“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问题”,提出关注世界各国发展的长处,“凡是外国的好东西,有用的东西,我们就要学,并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②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把“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发展才是硬道理”,^③看作是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问题、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和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根本问题。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的进程中,江泽民强调“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发展问题同党的性质、党的执政基础和地位问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进入新世纪,胡锦涛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⑤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要坚持统筹兼顾的方法,要坚持以全面、协调和可持续为主题。“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是贯穿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全过程的重大课题,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性论题。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主导性论题,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经济关系的根本特征,彰显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阐明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形成史”的对象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形成史”为对象特征的探索中,习近平经济思想围绕发展这一根本的和核心的问题,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作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理论贡献。

一是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作出准确判断,从“形成史”上揭示了新时代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根本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出深刻分析和准确判断,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⑥分析和判断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在制定“十四五”规划中,习近平经济思想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开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深刻阐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新特点和新要求,展现了新发展阶段中国“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理论新视界。

二是对第二个一百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整体擘画,从“形成史”上提出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理论主题和学术方向。2020年“十四五”规划制定时,正值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冲刺阶段、正值“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习近平经济思想从“形成史”上开创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新篇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彰显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主题。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的战略安排上,深化了“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⑦这一“分两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② 《毛泽东年谱》(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9页、第51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页、第377页。

④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8页。

⑤ 《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28页。

⑥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0页。

⑦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0页。

步走”的思想,对于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战略安排。

三是对新发展阶段作出战略瞻望和方略布局,从“形成史”上阐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的阶段性特征和系统关系。在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历史节点之际,习近平经济思想从构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增强由科技创新催生的新发展动能、激发由深化改革生成的新发展活力、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以及拓展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发展新局面等方面,对我国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系统阐释,成就了新发展阶段“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理论内涵。

四是对新发展阶段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特征的阐释,从“形成史”上阐明初级阶段量变和质变的历史辩证关系。“发展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而且是需要划分为不同历史阶段的过程”,^①这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以“形成史”为对象特征的根据所在。新发展阶段必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②在习近平看来,这一阶段也必然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③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经的阶段性特征,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必经的阶段性特征。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新发展阶段的动态分析,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以“形成史”为对象特征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理论根据和学理依循之所在。

二、习近平经济思想对“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拓新

在2015年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习近平不仅提出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概念,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要义和学理依循作出探索,而且还对“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的“系统化”问题作出学理上的首次阐释。

在首次阐释中,习近平对正在形成中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作出六个层面的概述: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观点,也是推动经济发展要牢牢把握的根本立场;二是坚持新发展理念,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按照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是我国发展的总要求和大趋势;三是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四是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五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六是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从“形成史”对象特征意义上看,对“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系统化”的首次阐释,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创新观点,同时又是这一创新观点发展的起点:到党的十九大,在根本立场理论上,习近平经济思想又形成党对经济工作全面领导的新思想;党的十九大以后,以上第三至第五层面的观点,集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整体性理论。

在党的十九大,习近平经济思想以推进新发展理念为主导,作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理论创新,从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战略支撑上,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根本途径上,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制度保障上,以及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必由之路上,拓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内涵,提升了中国特色“系统

^{①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99页。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02页。

化的经济学说”的“系统化”意蕴。

2017年12月,党的十九大之后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①从“七个坚持”理论要义上,展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涵盖的核心立场和本质特征、体制改革和经济运行、根本方法和战略思维三大理论板块,升华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系统性”的理论境界。

自“十三五”规划制定和实施以来,以新发展理念为主导,初步形成推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套制度体制框架;新发展理念作为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和主导线索得到证实。在这一过程形成以下三大理论板块:

一是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彰显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本质特征和核心立场。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能够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确立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二是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的三大理论支柱。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根本上就是要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旨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和关键因素;坚持完善宏观调控要适应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的变化,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推进经济工作发展的主线。

三是坚持问题导向以及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是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根本方法和战略思维。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回应人民群众诉求和期盼,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基本方法。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在根本上就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强预期引导,深化创新驱动,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三大板块的理论构架,是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探索的重要成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性概括”,^②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以“形成史”为对象特征探索的重要成果。在这一构架中,“本质特征和核心立场”板块,是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根本性质和学理特色的阐释,在“形成史”对象特征中具有相对确定性;起着“理论支柱”作用的板块,涉及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体现经济运行过程和阶段的理论,具有较为显著的变动性和演化性,在范畴和概念上更直接地体现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过程性演进和阶段性变化的特性,是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最为活跃和最具拓展性的理论部分;最后的“根本方法和战略思维”板块,对“理论支柱”部分具有指导性意义,在理论结构上具有战略上的相对稳定性和方略上的相对变化性的特征。在习近平经济思想中,作为“理论支柱”的板块,在范畴和理论上具有更为广泛的拓展性和更有特色的创新性。

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进程,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发展集中体现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的开创上,这一“理论体系”构成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新样式。

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绘制第二个一百年发展蓝图时,习近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内涵和基本特征的观点,第一次提出“我国要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

^{①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66页。

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思想。^①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在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阐释中进一步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②2023年2月,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首次提出“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的论断。^③这一论断从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主题上,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意义作出了深刻概述;从理论内涵和科学体系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作出深邃论述;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大课题上,对中国式现代化时代意蕴和思想境界作出深邃分析;从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和哲理作出深邃凝练。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集中体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要义,其中的集成性理论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新样态,升华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新的意境。

第一,对中国式现代化“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的阐释。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的思想脉络,是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新发展,拓新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根本路向和发展方向。

第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内涵和中国特色的阐释。习近平把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内涵同其特征和特色的阐释融为一体,在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上,凸显了保持历史耐心、顺应历史潮流、传承中华文化、坚持永续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等创造性理念。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丰富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特性和时代特质。

第三,对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阐释。中国式现代化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质要求,^④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其本质特征的内在联系,彰显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境界和时代意蕴。

第四,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的全面阐释。“十四五”这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牢牢把握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五项重大原则。这五项重大原则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大原则。

第五,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凸显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诸如“民惟邦本”“扶贫济困”等理念,成为深刻滋养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文化要素。“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⑥这一深刻的交互交融关系,同样深刻地蕴涵于习近平经济思想之中。

第六,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观念和重要关系的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凸显于“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68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8页。

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92页。

④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0页。

⑤⑥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

等及其伟大实践”之中。^①这六个“观”，深刻地体现和落实于中国式现代化主要内涵和本质特征之中，其中世界观落实于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特征性理论和实践之中；价值观彰显于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的目标之中；历史观呈现于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之中，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伟大的历史性成就之中；文明观体现于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之中；民主观凸显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提升美好生活的质量和水平；生态观体现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之中，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之中。这六个“观”，体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根本理念和主要观念，同时又从多方面丰富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理念和观念。

在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的阐释中，习近平提出“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②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的开创性探索，同样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重大成果，丰富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科学内涵，升华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新时代意境。

三、习近平经济思想与“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方法论境界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对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出“六个必须坚持”深刻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六个必须坚持”自然成为与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相适应的方法论体系。

在以“六个必须坚持”为基础的方法论体系上，一是在“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首次阐释，就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放在首位，指出“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提出“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③党的十九大之后，在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再次概括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是作为根本方法，要把它“贯穿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④

二是在“必须坚持自信自立”上，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自信自立，在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探索中作出一系列重大理论贡献。“正确认识 and 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就是“坚持自信自立”方法运用的结果。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设想过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搞市场经济，当然就不可能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对待资本的问题；列宁和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遇到资本大规模发展的问题。习近平指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在这一“伟大创新”的深入进展中，对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资本结构、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等一系列问题开始出现，就要“坚持自信自立”方法，作出我们自己的解答。习近平指出，面对现阶段的资本结构，“要探索如

^{①②}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

^③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

^④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63页。

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近年来,由于认识不足、监管缺位,我国一些领域出现资本无序扩张,肆意操纵,牟取暴利现象,“这就要求规范资本行为,趋利避害,既不让‘资本大鳄’恣意妄为,又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政治和经济问题。”习近平强调“遏制资本无序扩张,不是不要资本,而是要资本有序发展……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①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问题,必须坚持自信自立的方法。

三是在“必须坚持守正创新”上,习近平经济思想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发展和创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探讨的重要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机制、体制和制度多层面和多维度演进的探索中,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新的概括,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念,实现理论上的守正创新,使之“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②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等范畴和理论观点,都深刻包含着“坚持守正创新”方法的运用。

四是在“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上,习近平指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新探讨中,习近平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直面问题,提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经过二十多年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难以形成的。”^④从“问题意识”到“问题导向”“问题倒逼”方法,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方法中得到最为深入的运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意识,从“辩证法、两点论”的制度性和体制性规定及其关系问题为导向,作出两个方面的创新性理论探索。一是所有制结构和市场经济体制关系问题上提出,“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⑤二是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关系问题上提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⑥“坚持问题导向”方法,是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性理论的枢纽。

五是在“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上,习近平经济思想遵循“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⑦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中,以对经济运行的系统性分析为前提,从生产端发力,推进产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76—577页。

②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81页。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61页。

④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61页、第163页。

⑤ 习近平2020《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第16期。

⑥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58页。

⑦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785页。

业优化重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有效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从消费端着力,促进流通、分配、消费端对过剩产能和库存的有效化解;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反作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马克思认为,供给和需求作为市场经济系统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基本方面“说到供给和需求,那么供给等于某种商品的卖者或生产者的总和,需求等于这同一种商品的买者或消费者(包括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的总和。而且,这两个总和是作为两个统一体,两个集合力量来互相发生作用的。”^①供给和需求两种力量的竞争,在根本上“显示出生产和消费的社会性质”。^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既发力于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又着力于需求侧的结构性调整;既注重生产环节的决定性作用又凸显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反作用;既突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注重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强调发展社会生产力又不断完善社会生产关系。

六是在“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上,习近平经济思想从人类社会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上,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③习近平经济思想在对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现实的深刻理解中,探索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新变化和具有许多新的时代特征的新情况。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做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铸就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自觉和历史担当的精神境界。

在对习近平经济思想方法论的理解中,既要深刻把握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规定的方法论要义,也要深刻理解习近平在对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和怎样发展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问题探索中彰显的方法论上的思想智慧。2020年8月,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的讲话中,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经济学说”的方法论的阐释,实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方法论上的创新。

一要“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④面对新发展阶段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我们更要关注经济实践、投身经济实践。新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要立足于我国国情和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归根到底是对这一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理性认识的升华。

二要“深入调研,察实情、出实招,充分反映实际情况,使理论和政策创新有根有据、合情合理”。^⑤经济思想来源于经济发展的实际,是对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理性升华。在这一过程,需要在察实情中多出新招,也需要增强理性思维,在理论和政策多有创新。

三要“把握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短期波动中探究长期趋势,使理论和政策创新充分体现先进性和科学性”。^⑥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归根到底是要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并不排斥国外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重要的是,对国外特别是西方经济学,要坚持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要能借鉴和吸收各国经济思想中反映文明进步的各种思想观点;对西方经济学中反映资本主义制度属性的内容,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5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8页。

④⑤⑥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34页。

以及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不能照抄照搬,不能简单地做西方经济思想的“搬运工”,更不能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大商行的小贩”。

四要“树立国际视野,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①国际经济的交流和交往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仍然是人类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全面深化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要从国内经济和世界经济两个方面及其联系上,拓展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研究视界。

四、习近平经济思想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创新

“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这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狭义的”和“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划分的立论基础。狭义政治经济学是对占据“主体”地位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研究;^②马克思面对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现实,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那个年代的狭义政治经济学。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③广义政治经济学是对狭义政治经济学之外的各种经济关系研究的政治经济学。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第一个完整的世纪,其显著特点就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狭义政治经济学得以形成和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社会经历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以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占据“主体”地位的狭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产生,改革开放以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21世纪当代马克思主义狭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经济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狭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最新形态。

从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整体上看,习近平经济思想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简称,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涵盖的当代狭义的和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概称。这就是说,习近平经济思想既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也集中体现了当代资本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

发展和创新21世纪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有其理论上的必然性和必要性。2013年12月,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为主题的集体学习讲话时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规律,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④习近平强调指出,这“两个必然”,“是就人类历史总的发展趋势而言的,是历史规律的必然指向。”^⑤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还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重要论点“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⑥习近平指出“马克思的这一重要论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至今没有完全消亡,为什么社会主义还会出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那样的曲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预见的共产主义还需要经过很长的历史发展才能实现。”^⑦在“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历史辩证关系上,才能深入理解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规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3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4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⑤⑦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7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

律的必然指向”,也才能深刻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并存时代三个“为什么”的历史和理论的根源。

《资本论》对当代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习近平指出“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论断是武断的,也是错误的。”^①实践证明,即使在当今西方社会,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重要影响力。“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②当然,在21世纪新的时代背景下,对《资本论》的理论及其体系也不能照搬照抄,因为“世界格局正处在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产生了大量深刻复杂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课题。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本质,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③这里提到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两种主要形态。

在对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中,要高度重视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新情况新趋势的研究,凸显对其本质和规律性问题的研究,进而“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命运,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趋势的理解”。^④

在对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入涉及的重要课题主要有以下十个方面:一是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新变化以及经济关系特征新变化问题;二是新工业革命勃然兴起和科学技术巨大进步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问题;三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演进过程与经济社会“新形态”问题;四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长期“低迷”趋势及其根源问题;五是国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及其作用和变化问题;六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关系中阶层分化和就业、失业问题;七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关系中贫困化和两极分化问题;八是新兴工业国的发展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新变化问题;九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形式和周期性特征新变化问题;十是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以及生产方式、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矛盾变化新特征问题。

20世纪下半期,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不同、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有悖、历史和文化背景相异的国家和地区,形成相互并存的“共同体”。这种异质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并存格局的形成,对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新的发展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课题的探索中,包含的对当今世界以异质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为对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的探索,是对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作出的原创性贡献。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以“新型国际关系”范畴和学理为理论基础。面对21世纪世界历史的新的进程,习近平提出“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⑤2013年3月,习近平在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中提出“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⑥习近平提出的与当今时代变化相适应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阐释,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学理基础。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是以当今世界正在兴起的新一轮科学技术和深刻的经济政治

① 习近平 2020《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第16期。

②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21页。

③④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87页。

⑤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65—166页。

⑥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05页。

格局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人类社会面临着众多不稳定不确定经济政治社会因素为背景的。进入 21 世纪以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世界各国和不同地区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依存使得人类社会处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之中;在这一“共同体”中,每个国家都有自身发展的权利,都应该在更加广阔的视界内考虑自身利益,但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①这就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根由所在。

再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是适合于 21 世纪国际经济关系发展新特点的重大课题。党的十九大把“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列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2021 年 9 月,在第 76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讲话中,习近平提出的六大“全球发展倡议”,深刻地包含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课题。这些重大时代课题就是:坚持发展优先,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护和促进人权;坚持普惠包容,着力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坚持创新驱动,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坚持行动导向,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②党的二十大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的新高度,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③由此不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重大课题研究和理论要义的深化。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凸显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谋求人类共同进步、世界大同美好前途。中国式现代化既基于自身国情又借鉴各国经验,既传承历史文化又融合现代文明,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面对人类社会曲折起伏的发展进程,各国现代化道路探索历程艰辛。2023 年 3 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中以“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为题的主旨演讲中提出了五个“要”的重大课题,即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要秉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要树立守正创新意识,保持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性;要弘扬己达人精神,增强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要保持奋发有为姿态,确保现代化领导的坚定性。^④中国共产党将始终把自身命运同各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新助力,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创新做出新贡献。

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起,构成习近平经济思想对包括当代马克思主义狭义的和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在内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创新性探索,也是对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

(责任编辑:冀 木)(校对:曹 帅)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49 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513—514 页。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51 页。

^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93 页、第 97—99 页。